

易学探新

程石泉著

YIXUEXINTAN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新易探学

程石泉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学新探 / 程石泉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12
ISBN 7—5325—3576—2

I. 易... II. 程... III. 周易 - 研究 IV.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9359 号

易 学 新 探

程石泉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l@guji.com.cn

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2 字数 275,000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25—3576—2

B·412 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64063949

吕序

读“易”难，读易学家尤难。本书作者台湾资深哲学教授程石泉博士治易，今已逾七十年，于易深切著明，纵横通透，是国际知名的易学大师。你想真正把程博士的书读懂读透，亦易亦难。程先生 1970 年代自国外回到台湾，二十年时间完成三部书：一曰《易学新探》、二曰《易辞新诠》、三曰《易学新论》。在台湾称之为“程氏易学三书”。200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后两书合为一书，名曰《易辞新诠》出版。这是程先生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书。今上海古籍给他出第二部书，即“程氏易学三书”之第一本《易学新探》。

初读程先生书，你会觉得自己于“易”尚在皮毛之间。因为他把“易”搞得太通、太透、太深，你总有落后之感。我这话是亲有体验，绝非故意捧场。程先生 2000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《易辞新诠》时，我作为程先生的同乡小子给书作序，当时自以为读懂了他，竟不知深浅地给“程易”归纳出六条优点。这六条后来我逐渐发现讲得极肤浅，大体未入里。这次程先生又出《易学新探》一书，我又作序，我再仔细体味“程氏易学三书”，经过反复探索，才对程氏易学有些许了解，算得上进入了皮毛之内。这里就三点说明之。

一、程氏易学的学派定性问题。《易辞新诠》的序中我说“程氏易学”不是“义理派”，也不是象数派，现在看过《易学新探》各篇之后，认定程氏易学确确实实是义理派，不是象数派。先前我觉得他

对王弼、程颐颇有微辞，对清人焦循易学多有赞许，难以归入义理派。现在看来，程氏易学是宽厚的义理派：治易，既将义理置于第一位，又不排斥象数，甚至对象数有一定必要的研究。我现在觉得，这样的义理派立场是完备的、可取的。我越来越欣赏程先生概括易形上之学有十玄之门的提法。他说十玄之门是一纵通横通、通体圆融的体系。十玄是通贯的，举一玄，则其余九玄连带其中。《易》之为书在阐述形上之理，与今日西方物理学、天文学无关，亦非一数学书。《易》乃三代以来唯一汇集民族智能之哲学著作。中国古代儒、释、道三家各有其形上之学。儒家形上之学就在《易经》，朱熹倡导的“四书”则不在其内。《易》之为书，阐发“易”之广大悉备，絜静精微，蔚为一博大精深之形上体系。明明白白看清楚“易”之此一特点。如此，怎能怀疑程氏不是易之义理派呢！

我说程氏是位宽容的义理派，还因为他不是空洞地说道理，他对于《易经》固有的东西如成卦的问题、筮法的问题，都十分的重视，且相当着力地进行研究，取得成果。程氏 1973 年在《美国东方学会季刊》发表《〈周易〉成卦及春秋筮法》一文（英文原作，后译成中文），文章首先批评了朱熹在《易学启蒙》中的所谓《周易》成卦法及筮法，说朱熹企图把《周易》还原为卜筮之书，可是他采用了道家的筮法，与《系辞传》说的不一样。程氏据《系辞传》“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”一语的启示，对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计 23 个筮例进行了深入研究。令人信服地解决了其中关于“之卦”如观之否、泰之需等等和“艮之八”、“泰之八”、“屯之八”、“贞屯悔豫皆八”的“之八”这两个古人从未讲清楚的问题（详见本书该篇）。

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，程氏不仅仅重视《易》之哲学内涵，还重视《易》之卦和《易》之筮。他认为哲学的东西是从“卦”、“筮”而来的。他说：“约略言之，《周易》必曾经若干阶段：由包牺氏之‘结绳’

吕 序

八卦’，演变为周王室的‘占筮八卦’。由周王室的‘占筮八卦’演变后世中国人（儒家和道家）的宇宙论及形而上学基型理念之源泉。”（《周易》成卦及春秋筮法）可见程先生是义理与象数兼顾的。孔子也如此，《易传》里除形上之理外，还讲不少卦、筮问题。既然孔子是义理派，那么程先生必也是。

二、程先生治易，对易学史上千百易学人物，一向不存成见。批评人物总是是非两分，权威不怕，情面不讲，古人今人，此岸彼岸，一律对待。在“程氏易学三书”中，我看到了一位当代易学大师的风范。易学史上最具影响最受重视的人物莫过朱熹。朱熹学问做得最大，故瑕疵也不少。近百年言《易》者捧朱熹的多，真正敢讲实话，派朱熹一个“不”字的罕见。程先生则实话实说，朱熹他也敢碰。他说：“朱熹所传的《周易》筮法不是《周易》原来的筮法，而是宋儒杜撰的筮法，用来表达他的宇宙观。严格说来，宋的筮法与《周易》筮法无关。”又说：“实际上朱熹不曾把《周易》恢复其作为卜筮之用的原来真面目，因为他无法解说那记载于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的若干筮例。朱熹对于古代史臣所用的筮法迷惘不清，于是他采用了后世道家的筮法。那道家的筮法显然和《系辞传》中‘大衍之数’那一章所说的不一样。于是朱熹曲解经传的文字来凑合他的筮法。这因为宋儒的宇宙观须要把道家的宇宙论掺杂《易经》里去，所以宋儒不得不如此。我们不必怀疑朱子在知识上的诚信。”（《周易》成卦及春秋筮法）敢如此直白、具体、尖锐地派朱熹的“不是”，在易学界是不多见的。程氏批判汉易可谓不遗余力。他概要地指出秦汉凡治易者莫不崇尚驺衍，阐扬孔子易学思想者几无一人。前四史所载以《易》名家者，如京房、孟喜、梁丘贺、费直、高相、郑玄、马融、陆绩、虞翻、荀爽诸人无一人足称为治孔子之易学者，即使留下著作（经清人整理）的虞翻，言“易象”则支离破碎，言“易例”则混乱无条理，对于孔子易学之“微言大义”且“不得其门

而入”矣。对三国王弼之易学有三点评论，至为公允。一、扫象之说，非必其失；二、引导道家之玄理破除灾异迷信，其功至伟；三、使《易》沦为三玄之一，远离实际人生。至于孔颖达之《周易正义》，亦踵魏晋遗风，崇尚玄谈，不涉政治。与对汉易一样，程氏对宋易也持批评态度。朱熹之易学常在程先生批评之中。对程颐之《易传》亦有不留情面之批评。说“《程传》只是综合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王弼《易注》、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而成之美文而已。读来似乎其中有物，究实尽是似是而非之论，腐儒之言也”。宋易中他另一看重的人物是欧阳修，著专文《评欧阳修〈易童子问〉》，说《易童子问》论“十翼”非孔子作等等，并非无可嘉许，但持论偏颇，说理不透，以致引发疑窦，贻误后学。至于明人来知德《易注》与程颐《易传》同样不足取。清代开易汉学与易宋学门户之见，易学方面成就可观者尤少。程先生唯一称道的只有焦循。程氏认为焦氏治易自成体系。所言“旁通交易”、“当位失道”、“变通趣时”之理有足多者。唯“比例”之条例，虽开纵通横通之门径，终嫌泛滥。焦循是最引当代人注目的清代易学家。可是 20 世纪以来系统深入研究焦循的，程先生是第一人。程先生当年在南京写作《雕菰楼易义》一文时，大学刚毕业，只有 31 岁。程先生对清人治易的批评至为尖锐。谓清人治易囿于考据学风，从事于校勘版本章句，旁及文字训诂音韵，或旁及于典章文物制度之研究，如王念孙父子、俞樾、胡渭、张惠言、惠栋、孙星衍、方申之皆标榜以易汉学为宗，以恢复汉学为职志，于是补苴辑逸，为荀、刘、马、郑、孟、方、虞建立权威，虽一字一象，尊奉之为拱璧。进入民国的易学，程氏批评益加尖锐，端木国瑚著有《周易指》，杭辛斋刊有《易学丛刊》，皆享大名，程氏说皆不脱前人窠臼，了无新意。徐如死守汉学余绪，或专从考据文字训诂治易者，如于省吾之《易经新证》，或专从古代典章文物制度治易者，如高亨之《周易古经今注》及《周易古经道论》，或专从某一汉易

吕序

书中探索易象者，如尚秉和的《焦氏易诂》。程氏还概括指出，自东汉以降治易学者通病在视《易》为卜筮之书。又有人认为易学无他，不过“象数之学”而已。刻意求象，宣扬术数。汉易学家之愚昧导致清易汉学家之愚昧，而清易汉学家之愚昧导致今之古文字学家兼易学家之愚昧。读了这些见解，觉得挺痛快，至少以为对劲儿。如今易学界像程先生这样敢实话实说的并不多见。

三、程氏大学毕业后开始系统治易，至今七十多年，大体上走着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回台最后二十几年完成“易学三书”。《易辞新诠》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。这一本《易学新探》今又在上海出版，这真是中国两岸易学界的大好事。我读“程氏易学三书”，尤其读此《易学新探》，启悟良多。最快吾心者：第一，在《易这个观念》一文中，我知道了《易纬·乾凿度》“易”一名含易、变易、不易三义之说，原来不误。程氏解第一义之易字，言“创化”，包括旁通之“交易”。第二义之“变易”，应包括“换代”、“更新革命”、“意外突变”种种。第三义之“不易”者即言不因时间、空间、意愿而有所改变的观念、理想、原理、原则、价值、意义。郑玄将第一义之易字改为“易简”，且引《系辞传》“夫乾确然示人易矣，夫坤隤然示人简矣”以为证明。殊不知乾之“确然”是言时间之功效，坤之“隤然”是言空间之功效。郑玄解释为容易之易、简单之简，显然出于误解。后之孔颖达说“易”之名可谓最为完备通达，然而他也受郑玄误解的影响，把“容易”、“简单”作为“易”的注解，于“易”这个概念的本义大相悖谬。我以为，其所以如此，自根本而言，乃受道家的影响所致。

第二，程先生书助我深入了解了清代易学家焦循。先前我因读书不多，常常浅薄自用，表面看焦氏宗汉易，便骂焦氏易不可取。看程先生《雕菰楼易义》才认识焦氏治易的独创性。当年王引之、阮元评以“精锐凿破混沌”和“石破天惊”，实非过誉。程先生文章

指示我“无论其为旁通、时行、比例，盖所以示明卦爻之变动，藉此以通辞而已。夫辞者‘各指其所之’者也。焦氏于此颇多发明”。这段话我以为最为深刻，启我最大。按焦氏意，卦爻辞本身无意义，不过符号而已。比如“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”之辞，《小畜》（旁通《豫》）、《小过》（旁通《中孚》）都有，其实只是符号而已，犹如画勾股割圆，用甲乙丙丁等字指示其比例之状，按而求之一一不爽。意义存于甲乙丙丁等字之中，而甲乙丙丁等字，则无义理可说。卦爻辞自身无意义可言，作《易》者藉此以表情寄意而已。于“易”因爻之变动，而有种种价值等差之呈现，乃以辞表达之。辞之组织虽各成文理，但其自身不限于文字所表之义。数千年来，说易者囿于世俗之见，于卦爻之辞喜自字面求解。对《易》中涉及之历史故事，直接求解。但易辞实受一根本原则所支配，其所称引之故事，乃卜筮上起影射、比喻的作用。《易》中之历史故事已失去历史的具体性，转变为抽象的符号了。焦氏于其《易通释》论之至详。夫辞者乃各指其所之，此为治易者应体认之第一要义。前此，我未曾仔细研究焦氏书，今反复读程先生文章乃幡然大悟，知道了了解易辞的基本途径。

第三，《系辞传》是“十翼”中的大头儿，孔子的诸多想法尽含其中。但是存在问题不少，难以理解。程先生《〈易·系辞传〉哲理探》一文却分析透辟，难点多有突破，可谓纵通横通上下皆通。有启于我者多多，例如关于“三才之道”（《说卦传》亦有此言），说天地人三才之道虽为常语，但实为中国哲学精义之所在。中国先哲对于“天人之际”的看法最为正确。又如讲到乾坤时，总是强调“乾之所言者为时间之功能”，“坤之所言者为空间之功能”。释“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”，说天地者时间、空间也，氤氲者，原始化生之质料也”。讲“乾坤成列”一语说：“乾坤乃宇宙创化之基本时场。乾坤安排有序则易行乎其中，无乾坤则创化（易）无由生。”讲“是以广生

吕序

焉”句，说《易》中言乾皆指“时间”，言坤皆指“空间”。讲“广大配天地”句，说乾为大生，配天，天者时间也；坤为广生，配地，地者空间也。讲“夫乾确然示人易矣”句，说“乾者时间也，古往今来也。确然，准时也”。讲“爻也者，效此者也”句，说“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外乾坤之两爻，效此者，效乾坤。乾坤实时空，即宇宙”。又如讲“夫易开物成务”句时，说“开物者，创化生生，‘成务’者，发乎事业也”。简明扼要，切中肯綮。总之，先前《系辞传》里不少语词似懂非懂，很多话较不了真。读了程氏文，可以说明白了。《易》确实难读懂，但《易》毕竟只有一个。易学家则数以千计，各有特点，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程先生论易就是这样，纵通横通，千姿百态。因为太丰富了，读起来不容易一下子明白。可是只要用心深入下去，纵然千丝万缕，也总有一线穿。我跟程先生1997年开始交往，通信虽多，晤面不过三次，而彼此友情十分深厚，这不是因为我们祖籍是小同乡（我祖籍旌德，他祖籍歙县），而是因为我们易学观点相近。他的易学论著我读来有亲切感，仿佛灵犀相通。乍读有难度，可是一旦深入，便有一通百通、海阔天空之感。这本《易学新探》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想再读。程先生出书，是为序。

后学吕绍纲拜手谨识
于长春吉林大学教师公寓
二〇〇三年阴历八月初吉

俞序

古愁莽莽不可说，化作飞仙忽奇阔。
江天如墨我飞还，折梅不畏蛟龙夺。

正拟为程石泉师之大作《易学新探》在大陆出版作序时，清末诗人龚定盦的名句突然浮现心头。龚定盦是石泉师平生最欣赏之诗人，实乃清代身通儒佛之稀世奇才。龚定盦认为儒家思想渊源于六经，六经先孔子而有。俗儒所称十三经者，《孝经》乃曾子弟子所作，简易泛滥，无关宏旨；《论语》为孔子弟子所记孔门之言辞；《孟子》宜属子书；《尔雅》实为字书；其余《礼记》三传，则陪贰于经：皆不足以名为经。六经之中，唯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传世。龚定盦以六经为尊的构想，已暗示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方向：应恢复以六经为本之原始儒家之学，而六经之中又以《易》为先；这便是石泉先生与其师方东美先生毕生所致力者。恢复原始儒家本来面目可说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涓涓清流，此有别于另一流行趋势，即以赓续宋、元、明、清之理学为主所谓之“新儒家”。此派学者言必称孔、孟、程、朱，行必究学案讲友，以儒家学说无非道德仁义，其实践之道则在心性修养。此项主张宋明理学家谓本于“四书”与《易传》，于其他各经无所沟通，此可谓“四书之儒家”，而非“六经之儒家”也。此项宋明理学时以佛（实为禅宗末流）、道（实为道士虚言）之说模糊儒家本旨，真可谓杂家者流。以

俞序

“人事”说“天道”，不免蔽于一曲。又因彼此意气用事，时而陷于心理性理、先天后天、天理人欲、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。后世所谓之“新儒家”亦难脱此窠臼，致令中国哲学研究潮流趋于沉沦陷溺。方、程二先生以六经为宗，尤重“易学”。东美先生阐发“易形上之理”，石泉师继之，乃有“程氏易学三书”之作，而《易学新探》正是其中之第一部（其余两部为《易辞新诠》与《易学新论》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合刊为《易辞新诠》，已于2000年问世）。方、程二先生苦心孤诣，其学实兼古今中外，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之所仅见。

程师石泉本籍安徽歙县篁墩，寄籍江苏灌云县。生于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阴历十月十八日，淮北盐商世家，自小从塾师学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之类启蒙之书。及长，立志向学。民国十四年，考上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，民国十七年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。当时方东美先生甫自美威斯康辛大学学成归国，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（原东南大学），所引介之西学除希腊哲学外，兼及当代重要之英美哲学家如布德利（F. Bradley）、桑塔耶那（G. Santayana）、詹姆士（W. James）、杜威（J. Dewey）及怀特海（A. N. Whitehead）等人之学说。东美先生重视形而上学，有别于北大、清华之偏重数理逻辑，且以科学为号召，倡言反对“玄学鬼子”。石泉师受东美先生之影响，改习哲学。师生年仅差九岁，唱和相与，遂成莫逆。日后东美先生曾有“赠门人程石泉”诗一首：

曾向钟山伴老松，琼华秀出锦屏峰。
色融丽日晴霞地，香泛希声密义钟。
横溢生机侔造化，寥来元气与陶镕。
随云舒卷存天壤，缥缈游文喜再逢。（《坚白精舍诗集》）

民国廿二年，石泉师自中央大学毕业后曾任职考试院。他与东美先生因对易学研究之兴趣，乃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南京发起“易学研究会”，邀集李证刚、高确庄、钱叔陵诸先生在家中集会，发表论文，会中论文合为《易学讨论集》一书。其中收有方东美先生口

述、石泉师笔记《易的逻辑问题》一文。民国廿六年，石泉师以庚款之助，负笈英国牛津大学圣体书院（Corpus Christi College, Oxford University），主攻“希腊研究”（Greek Studies），亲炙李文斯顿（Richard Livingstone）、莫瑞（Gilbert Murray）等古希腊研究名家，石泉先生是以终生雅好古希腊哲学思想。后转读伦敦大学大学书院（University College, London University），迄 1939 年欧战爆发前夕，赶乘货轮返国。

对日抗战期间，石泉师曾短期担任教育部长之英文秘书，随因不惯官场生活离去，乃以翻译 Farrington 之著《西洋科学初期史》一书，受知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，任教于浙大贵州湄潭分部。抗战期间，物资短缺，石泉师与师母抚养七子，备极艰辛，却仍著作不歇。民国三十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《雕菰楼易义》一书，实为泉师大学毕业后之旧作。在浙大期间，则撰得《周易六十四卦生生之序》一文，后收入《易辞新诠》中。

1945 年，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，为避战祸，泉师乃携眷赴美。1958 年取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（Washington University, Seattle, Washington）之哲学博士学位，随后任教匹兹堡大学（University of Pittsburgh）、宾州州立大学（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, Capitol Campus）共十四年。自 1978 年返台，历任台湾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、东海大学教授，迄 1991 年退休。在台任教期间石泉师著作最为丰富。1979 年《易学新探》初版，共八章，并附《雕菰楼易义》一文，乃石泉师积四十年治易之心得。1995 年在台出版之《易辞新诠》以及 1996 年出版之《易学新论》，则涵盖先生在台廿余年研易之新见。今三书均得在大陆与读者相见，足慰先生平生之愿。

大陆版《易学新探》总十章，前八章与所附《雕菰楼易义》为原书内容，最后两章则取自原《易学新论》一书。第一章“‘易的图、

象、数三呈现’简义”略论构成“易”之三元素：图、象、数。石泉师明示易学研究，旨在抉发《易》中先乎历史、先乎逻辑、先乎科学之创造性智能与文化基型理念，而《易》之图、象、数之研究，正所以提供其重大线索。又《易》重“时用”，是为《易》之核心概念。第二章“‘易的原始’与‘卜筮之书’”在说明《易》的历史演变、孔子之贊易，以及嗣后《易》之遭受误用误解。石泉师以为“卜筮之用”仅是《易》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，自孔子贊易之后，《易》乃成为哲学宝典。而“帝乙归妹”、“文王幽于羑里”则是《周易》肇始之历史背景。此一故事，石泉师于《易辞新诠》一书发挥最详，颇饶意趣。第三章“‘卜筮之用’的心理学”一文，在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荣格(C. G. Jung)的理论，说明卜筮之用的心理学预设了超越“机械因果律”的“偶合性”(synchronicity)概念。“卜筮”不是迷信，而在利用筹算机遇，考验人心，决疑定志而已。第四章“周易成卦及春秋筮法”是石泉师于1973年在《美国东方学会季刊》(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)发表之英文论文翻译而成，旨在根据《左传》中之易例，说明《周易》成卦与变卦之法。第五章“‘易’这个观念”在以宇宙论与形上学的观点分析“易”的哲学含义。《易》中所言“天地交配”乃一“创化比拟”，各卦之彖传时时描摹创化生生的详情细节。乾、坤二卦不仅象征天地，且象征“时间”与“空间”。中国古易学家以宇宙创化于一时空合一之历程之中，与西方科学发展新趋势(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)正不谋而合。石泉师并指出除“时空合一”外，“易”中尚可演绎出“体用不二”、“旁通相关”、“创化生生”等等概念。第六章“易象新诠”据《系辞传》“立象尽意”之说，分析易辞中之“意”有“心意”、“情意”与“意义”之别，“象”有“意象”、“事象”与“物象”之异。“易”之取象，如文字出于人心之“象征作用”，而“易辞”之作，则如诗之运用赋、比、兴。石泉师并指出传统易学就“易象”问题可分为“泥象”与“扫象”两派，他对这两派都有所批

评。第七章“《易经》与现代物理学”试图抉发“易”与现代物理学兼容之处，即“时空合一”、“体用不二”、“旁通相关”，以及“创化生生”之思想。“易”与现代物理学不同之处则在“易”以“人为宇宙之中心”，阐扬天地人三才之道也。第八章“《易·系辞传》哲理探”是石泉师诠释《系辞传》的一家之言，他以“易”之所以为形而上之学，乃出于《系辞传》所作之阐扬发挥，且《系辞传》为一赞誉文章，不重逻辑，无端重复，甚而不免错简、错字、衍文。先生乃提修正意见，俱据文章脉络，合乎理所当然，颇具参考价值。至于所附《雕菰楼易义》，如前文所说乃石泉师于易学最早之著作，旨在根据焦循所著之“易学五书”介绍焦氏易例，并检讨其中矛盾缺失之处。

第九章“评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”与第十章“评章太炎论《易》与《唯识》”均为极具批判性之论文。前者主要针对欧阳修质疑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均非孔子所作提出反驳，列论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、《说卦》、《象传》、《彖传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与孔子之关系，并申论欧阳修疑《系辞》所言成卦之事为不足取。要之，石泉师对欧阳修开后世标新疑古之风颇有微辞，旨在纠举其失而已。后者则对章太炎先生论《易》，并以“唯识”比附《易经》，颇多批评。太炎先生虽意在西学，却受限于时代与语言，于西学难以通达。太炎先生着意于“唯识”之学，并以之诠释文王之幽囚羑里与卦爻辞之含意，实属牵强附会。太炎先生以“唯识”名相诠释卦辞，是以“业惑因缘”之说曲解《大易》创化生生之理。惜乎太炎先生虽博学，却无见于古易之中我先民之哲学智能。

《易》之为书广大悉备，极尽神妙。石泉师自幼因家学渊源而喜易，终身不渝，至今已逾七十载矣。石泉师曾广搜易学著作千余种，见其如不归诸“汉易学”，即归诸“宋易学”。深究之后，徒增疑惑，于是另辟蹊径，而有“程氏易学”之作。“程氏易学”之作，不在因循汉宋易学，而在以哲学眼光抉发古易智能。在当代中国哲学

俞序

家中，方东美先生首见古易，具有宇宙观、人生观与价值观。《易》中所见中国人之宇宙观，在以宇宙为生命流衍之场所。《易》之“太极”为万象根本，创生天地，化育万物。又创化生生，因人之参赞，而有各种不同之价值，真、善、美、圣，炳然呈现。东美先生之论《易》，可能近乎“生机论”(Vitalism)、“功能论”(Functionalism)、“自然论”(Naturalism)、“创化论”(Creativism)、“人本论”(Humanism)，而非“唯物论”(Materialism)、“实体论”(Substantialism)、“超自然论”(Supernaturalism)、“机械论”(Mechanism)，或者“泯灭人性论”(Dehumanizationism)。东美先生之论《易》，实乃一贯串本体论、宇宙论、价值论之“机体论”(Organicism)哲学。石泉先生承其师说，分就易辞、易理、易象、易数、易图、易史加以深究，为此千年难解之谜，提供锁钥。“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古易学家已明白揭示《易》之作出于我民族之忧患意识，究其实则在阐述形而上之理而已。方东美先生有见于此，乃提出旁通之理、生之理(或生生之理)、爱之理、化育之理。石泉师除不及“爱之理”外，更细而分之，称之为“易形上十玄门”：一、乾坤成列，二、生生谓易，三、新新不停，四、旁通时行，五、二五得中，六、三才之道，七、成性存仁，八、化成天下，九、穷通变久，十、保和太合。此说以列于本书之自序中，其发扬光大，尚有待来兹。

俞懿娴
谨序于台中大度山
时任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
2003年8月癸未仲夏

自序一

余童年屡睹先父祝三公用铜钱卜卦，姻长赵礼卿先生据《易》爻辞道吉凶，深感困惑。稍长亦自为之，但非以之卜个人之行止祸福。实因余方溺于博奕，而卜筮易数与骨牌及棋道有关也。入大学后，读罗素所著数学哲学书及罗氏与怀特黑合著之《数学原理》，极感兴趣。求与朱熹《周易启蒙》及邵康节《皇极经世》中论易数部分相参悟，又觉无由勾贯。因方师东美先生之启发，余始泛滥于易汉学、易宋学著作之中，深苦所知者少，而所惑者多。时于南京城中获财政部钱叔陵先生、监察院高爵庄先生、中央党部刘伯闵先生谈《易》，同意发起“易学研究会”，俾能各抒所见，相互切磋，以余在成贤街之寓所为临时会址，时为民纪二十五年之事，并恭约方师东美先生、李师证刚先生，共襄其成。前后共有若干次集会，由各大师分担讲解。时北方学人如张洪之、尚节之亦远道莅会。但相聚一堂，谈论易学者不逾十人。讲辞见《易学讨论集》（尚节之稿未缴来）。时以作者即将负笈英伦，将该集稿交付刘伯闵先生，旋在商务出版。该书各篇各抒己见，互不相牟。

本书首篇乃作者所拟《易的图、象、数三呈现》之引论。作者藉《易的原始与卜筮之书》及《卜筮之用心理学》两文，以澄清在易学史上“尊经”与“毁经”之争，并确立《易经》在中国文化发展中重要作用，及其昌明晦塞之经过。《易》之原始所以“通神明之德，类万